

《東華漢學》第 14 期；217-240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1 年 12 月

【學苑春秋】

校勘、注釋與論述 ——王夢鷗先生治學之博覽與縱深

賴芳伶*

【摘要】

王夢鷗（1907-2002）先生自幼研習國學，及長負笈東瀛，入早稻田文學研究所，接觸日本師友，涉讀世界文學、美學諸潮流，融貫舊學與新知；其日後的劇本創作、文學理論的探討，以及嚴謹之治學方法，均導源自此。

先生具備西方人文視野，復能縮合傳統中國禮學文化、社會制度、民情風俗，與歷代文論詩論，互為參照，彼此貫通，其深厚的治學功力常展現於各種研究當中。諸如中國古典小說、禮學、現代文學，與中國文學批評，具體成果有：《禮記研究》、《漢簡文字》、《鄒衍與陰陽五行說》，《文心雕龍》、唐詩、《唐人小說校釋》（上下），以及中外文學理論等等。

*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本文擬擇取先生若干篇章，管窺其治學脈絡、方法與見解，要分為校勘、注釋、論述三項，必然掛一漏萬；惟期許與當今學子緬懷先輩篤實敦厚之學風，進而效法其樹立之人文典範。

關鍵詞：王夢鷗、治學方法、人文典範

一、前言：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¹

王夢鷗（1907-2002）先生的學術成就，堪稱二十世紀新一代知識人的典範。

先生生於民國前五年，福建長樂人，寄籍福州，自幼習染藝文，民國15年至18年（1926-1929）就學福建學院研習國學。畢業後於民國19年（1930）赴日本學習日語，20年（1931）九一八事變後返國。民國22年（1933）再度負笈東瀛，入早稻田文學研究所，此期間先生得以接觸各種世界文學潮流，廣泛閱讀歐西劇本，溯源美學基礎。可以說，先生往後的劇本創作、文學理論的探討，所以能夠融貫舊學新知，理論實踐並重，實導源於此。

留日經驗對不少清末民初以至五四的知識分子非常重要，因為當時的日本，已成為一扇開向世界新知的窗口，如魯迅（1881-1936）、周作人（1886-1967），其畢生學問與出處之道，顯然都與日本有關，並且於時人後人皆產生深遠的影響。王先生亦然。他嘗說，入早稻田大學研讀，使他有機會到靜嘉堂文庫及尊經閣閱覽古籍，也曾至京都遊歷。所結識的日本師友，對其學術研究影響甚大。如從事唐代研究的平岡武夫，就對他日後的唐人小說研究幫助很多。據聞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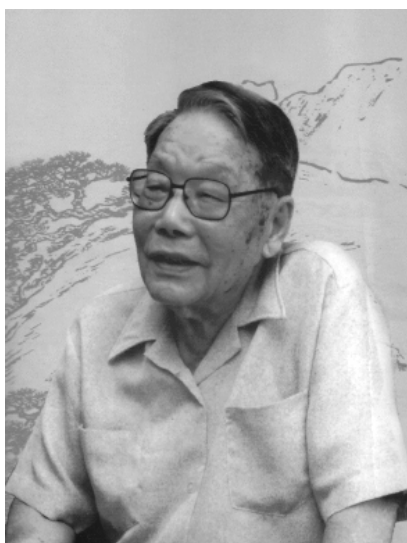


圖1 王夢鷗先生
（出自林明德，《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

¹ 出自宋朱熹〈鷺湖寺和陸子壽〉詩句，此處藉以發明王夢鷗先生新知與舊學之相互為用。

岡氏先將《全唐詩》、《全唐文》、《新唐書》、《舊唐書》及許多唐人筆記資料做成索引後，才動手撰寫論文。又如花房英樹，專研白居易，治學也是由索引的編製開始，將白氏的生平交遊都考察得極清楚。這種由基礎材料著手的做法，也成為王先生日後嚴謹治學的態度。

先生與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池田末利等知名漢學家都有往來，和東京學派、京都學派的文人亦有所接觸。其它如研究唐人小說的內山知也，精於六朝文學的小尾郊一，與先生都是好友，小尾氏還曾經邀請先生至廣島大學客座任教（1968-1970）。

民國25年（1936）先生返國後至中央電影廠編寫劇本、影評。中日戰爭期間，偕夫人回湖南老家，在中學教書。之後因小學同學薩本棟（1902-1949）邀約，至廈門大學授課，從此轉進學術研究領域。²廈大在林語堂（1895-1976）、魯迅、施蛰存（1905-2003）、林庚（1910-2006）等名學者的啟導下，新舊文學的研究均有可觀的成果。王先生任職廈大前後七年（1939-1946），除講授《禮記》等課程外，勤於劇本創作，熱烈演出，激勵民心士氣。³民國38年（1949）抵台，又採擇民間故事寫成《洛陽橋》三幕劇，可以見出先生以所學理論符應社會實況的創作成績。⁴

自民國35至45年（1946-1956）的十年間，先生擔任中央研究院祕書，博覽院藏豐富典籍，傾力於研究中國古典。迨全院隨國府遷台，先生任教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所，以迄民國66年（1977）退休。這段期間先生所授課目有「文學概論」、「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禮記」、「新文藝」與「中國文學批評」，同時從事《禮記》、漢簡文字、鄒衍與陰陽五行說、《文心雕龍》、唐詩、唐人小說以及中外文學理論的探索。⁵

² 參見林明德，《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頁3-4。

³ 參見王國良，〈王夢鷗與唐代文學研究〉，《中國唐代學會年刊》第十四期（2007.11），頁11-12。

⁴ 參見〈王夢鷗教授及其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收於《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第一卷（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79），頁276。

⁵ 〈王夢鷗教授及其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頁277。

先生精研當代美學，以此精神貫注於「禮」的精義，嘗謂禮即「生活藝術化」，儒家充分發揮此一理想，拿來作為人類生活的典範。先生治經最擅長禮學，意在追求禮學的現代化，不惟前人德業得以日新又新，現代人亦能藉此了解中華文化的實質。他自述在研究文學之前，都特別讀三禮；因為對三禮的研究是了解中國文化的基礎，周公、孔子很具體地呈顯文化基礎的所在。研究經書中的禮，即是研究社會倫理、社會關係、社會生活與社會習慣；後世雖然時代變異，但大體上社會的結構並沒有動搖。只是到了近現代，受到西洋思想的衝擊起了很大的變化，其實現代所講的新文學的骨子基礎就在這裡。⁶

留日期間開啟先生研究美學的契機，並促成其日後多種新文學與文學理論的撰述，除〈小說概論〉、《文藝技巧論》、《文學概論》、《文藝美學》之外，又曾翻譯韋勒克（René Wellek）、華倫（Austin Warren）合著的《文學論》（*Theory of Literature*），這些文學理論著作融會舊學與新知，將西洋文學的新說（例如美國新批評理論）與中國傳統之義旨（例如《文心雕龍》），綜合考察，冶為一爐，開創為一家之說。⁷為了將這些理論融貫到中國文化裡去，於是必須為中國的文學藝術尋根。先生在專注於《禮記》研究的同時，尚且留意到中國的古代藝術、審美思想，以及歷代文學批評理論，都是因為此種原故而有系統地衍繹出來。⁸

先生的《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特別強調「文學就是語言的藝術」⁹，深刻周詳討論中國文學的特質、原則，時時匯通西方的美學、文論和批評，以傳統和當代文學作品為例證，指出：「典雅似乎是我們正統的審美觀念，雖然其間還包含著很多道家的、甚至佛教的精神在內」。¹⁰因為具備當代西方文學美學思潮的視野，復能縮合傳統中國禮學文化、社

⁶ 《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頁 6。

⁷ 〈王夢鷗教授及其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頁 277-278。

⁸ 王國良，〈王夢鷗與唐代文學研究〉，頁 12-13。

⁹ 參見《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臺北：里仁書局，2009），第三章「語言的藝術」，頁 15-24。

¹⁰ 參見〈中國審美思想窺源〉，收於王夢鷗先生《傳統文學論衡》（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 316。

會制度、民情風俗的移易變化，與歷代文論詩論彼此參照，使得先生深厚的治學功力，得以貫通地展現於各種研究當中。

以下擬擇取先生若干篇章，管窺其治學脈絡、方法與見解，初分為校勘、注釋、論述三項，¹¹其實三者乃相輔相成，庶幾以為當今學子效法參酌的典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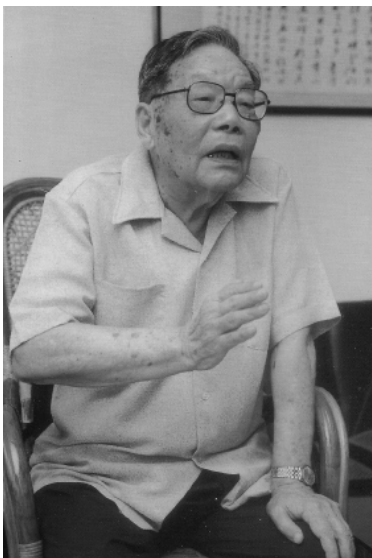


圖 2 王夢鷗先生

王夢鷗先生（出自林明德，《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

二、校勘版本的基礎工作

胡適（1891-1962）嘗言，做人宜在有疑處不疑，為學則應於不疑處有疑。這句話王先生也說過，¹²顯然是省思傳統、鍛接當代的五四一代知識人的共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問題意識」。做學問首先要問的，即問題意識，連篇累牘人云亦云，雖然不無整理之功，畢竟離真正的學問之道尚遠。問題意識從何而來？其實不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當然最後還得落實論述，顯現效用。先生以為，讀書於不疑處有疑，逐步推敲一再審思，才能產生創見。這樣的新意，

¹¹ 王夢鷗先生《唐人小說校釋》「前言」云其體例有三，一、廣為檢對異本以校訂字句之疑偽。二、有關唐人習用字句或與後世不盡相同者，以及藻飾辭面而縮造典語故實者，亦復引據原書以為之解釋。三、至於每篇之來歷及其作者身世，凡有助於作品之理解併為敘錄以附於每篇之後。《唐人小說校釋》（臺北：正中書局，1983）。鍾來因依先生自述之「校訂、解釋、敘錄」體例，略為更動字面，改稱之為「校勘、注釋、論述」但不失原義。參見鍾氏，〈王夢鷗與唐代文學研究〉，原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一卷第四期（1991.12），頁103。本文主標題參據鍾氏用法，特此說明。惟內涵較鍾文詳贍許多，且並不限於談論先生之唐人小說研究，此其一；尤其舉証述明先生之校訂、解釋、敘錄三者間，乃進出於禮學、史學、方志、類書、文學、美學，而多所匯通。此其二。

¹² 《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頁26。

應該不是當今學界常見的天外飛來，全無貫通的破碎尖新。國學大家陳寅恪（1881-1963）嘗謂，讀書須先識字。¹³聽起來如此尋常的話語，用心的人都曉得，其實就是博學的起始。「識字」乃有清一代樸學家治學之根本綱目，特重名物訓詁和文獻考據。王先生研究學問常不拘煩瑣舉證，逐字逐句比勘辨偽，此一注重小學之讀書方法與研究方式，實亦於清人治經之途術有所沿循。

識字關乎語言文字。王先生說他小時候就讀經，如《三字經》，即使長大後不是要走研究經書的路，幼年還是一樣下功夫。這個道理他在日後逐漸明白，原來中國文學為何具有特別的風格，乃緣自經書是中國語言之母，因為文言文的母語才是真正的母語。文言文就是從經書一代一代傳下來的，而後代的古文復古運動，即是將母語一代承傳下來，儷詞的系統亦是這樣。除此之外，先生又謂，還有一個民間文學的系統，因為許多人事物理不能以文字記寫下來，只能屬於口頭流傳。有時候只記錄了聲音，但所記錄的聲音不能跟意義會通，所以讓人看不懂。先生推測，經書當中所保存的就是古代的語言，古代的語言即文言化。比方《詩經》，不可能原本字數就那麼整齊，應該是經由抄錄者重新改造過。就像魏晉以後，將聲音長短不一的古樂府集中用五言，即五個字五個字齊整表達出來，有的用翻唱來附和它的體裁，故不妨說，五言詩多半是從樂府轉化而來的。可惜當時沒有足夠的資料流傳下來，因此便無法證實。¹⁴

又如有時我們會在韓愈（768-824）的文章中發現一兩個很奇怪的字，而他之前的人都沒有這樣用，王先生就懷疑這是當時的語言。他認為唐人小說中往往還保留一些口語，很可以拿來作為研究唐代語言的資料。¹⁵其實所有的文學、文字學就是討論說話。¹⁶而各種文類的詩歌、散

¹³ 俞大維〈談陳寅恪先生〉提及陳氏常說此語，主要是指陳氏對於《說文》與高郵王氏父子訓詁之學下過一番苦功，對十三經多能背誦，每字必求正解，《皇清經解》和《續皇清經解》更是手邊書。《談陳寅恪》（臺北：傳記文學，1970），頁 2-3-6。

¹⁴ 《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頁 11-12。

¹⁵ 同前註，頁 12-13。

文、戲曲和小說中的語言文字，不論對作者或讀者而言，都必須具備情感、知解和想像這三樣要素。¹⁷研究者若想從這三樣要素掌握文本的菁粹，都不能不從「識字」著手，也就是「要先把文字讀通」。先生強調，唯有文字讀通了，才能了解寫的人如何行文造句；進而注意其結構、作者身世……等問題。顯然他所謂的「識字」，精確的指涉，就是「校勘」。

即以禮學研究的《禮記校證》為例來說，先生以阮元本為底本，參酌晚近出世之鈔本刻本，比對其間文字的異同；復據秦漢古籍、隋唐類書互勘其章句得失；進而就歷代注解之書及晚清學者專論，從有疑義處審定其間的錯謬；終而指出該書非一家之言，其文亦非小戴之舊，今本四十九篇非輯成於西漢，應該是東漢後才成書。先生的《禮記今註今釋》，乃是將前世學者為《禮記》所做的注、疏、集解羅列起來，並且附錄重要的相關著作、演禮圖，以及近人所作的明物圖考等等，再佐以現代人的觀點、語言，審慎註釋翻譯，以期有助於今人對《禮記》的閱讀接受。先生如此細密的研究解析，早已成為學界極重視的禮學入門書籍。¹⁸

而這樣的校勘功夫，亦可見於先生的古典小說研究。先生曾自述：「我是用研究經書的方法來研究文學、研究小說的。中文系經學的訓練，對於文學的研究很有幫助，像考證，就可以用在文學作品上。」¹⁹例如唐人小說名篇〈霍小玉傳〉，正文開始有云「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先生發現〈霍小玉傳〉全文稱「李」為「生」為「十郎」或「李十郎」，從未用「益」字，正合乎此類小說的筆法，因其主旨重在敘事，意不在稱名。故先生以為此處「名益」二字，不特無助於敘事，反見贅尤。尤其此作果若成說所云，是蔣防挾怨攻擊李益之作，則以兩人年代之相近，實在不可能出之以指名道姓的寫法，惟歷

¹⁶ 同前註，頁 22。

¹⁷ 《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頁 26。

¹⁸ 《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頁 34-38。

¹⁹ 參見黃奕珍、丁肇琴，〈王夢鷗先生的唐詩及唐人小說研究〉，《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七期（1996.11），頁 20。

來讀者習焉不察已久。對此疑點，王先生詳加考辨，指出本文先見於陳翰《異聞集》，而陳氏編輯舊文，往往有間附注語的習慣，因此合理懷疑「名益」二字應為陳氏附注時羈入。若無此二字，似尤合乎當時小說之體裁。²⁰此疑義之提出看似微小，其實嚴擇版本，謹慎考據，往往會進一步關涉到研析深度，影響解讀境界。

先生附於〈霍小玉傳〉篇後之「敘錄」有云：

《太平廣記》卷847〈霍小玉傳〉，題下注曰蔣防撰，而篇末未注出於何書。其後王銍《補侍兒小名錄》，曾慥《類說》，吳开《優古堂詩話》，吳曾《能改齋漫錄》引錄其事，皆云出《異聞集》。《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異聞集》十卷，注云唐末陳翰撰。按其編錄年代雖較《太平廣記》為早出，然其書不傳於宋後，後世類書及說部所轉載者，蓋並出於《太平廣記》。²¹

由此可見，只為了正文有可能誤羈「名益」二字，先生查考了《補侍兒小名錄》、《類說》、《優古堂詩話》、《能改齋漫錄》、《新唐書·藝文志》等書，為的是儘可能考見原文的真面目。此種治學態度證明了閱讀任何文本時，初步校勘工作的重要，甚至因此連貫出後續的注釋和論述。

再以〈虬髯客〉為例。先生於該篇「敘錄」云：

此故事見載於《太平廣記》卷193「豪俠類」，篇末注「出《虬髯傳》」。舊刻本《太平廣記》書前列有引用書目，其中《虬髯客傳》當是本文來源。本文言及隋煬帝末年，四方擾攘之際，一道士嘗有爭取天下之意，及見李世民，知天命所在，遂爾退讓，使李氏得以創建唐朝。唐末道士杜光庭乃節取之編入《神仙感遇傳》，用以張揚道士功德，恐非本文撰者初意也。原撰者姓名既已失傳，南宋人或據《神仙感遇傳》，即以杜光庭充為本文撰

²⁰ 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上）》，頁200-201。以下略去先生稱謂，簡云《唐人小說校釋（上）》。

²¹ 《唐人小說校釋（上）》，頁214-215。

者。……《太平廣記》所載此文，元明以下類書說部多從轉錄。自《說郛》引《豪異秘記》至《顧氏文房小說》、《虞初志》，或題杜光庭撰或題張說撰。……余嘉錫謂明人好刻叢書，往往割裂錯謬，甚至杜撰書目，妄題撰人（《四庫提要辨證》十五〈辨《古今說海》〉），固無足論；清人重編《古今小說》、《唐人說匯》及《唐代叢書》，猶相襲稱，而中間字句出入亦頗歧異。²²基於以上理由，先生乃題〈虬髯客〉的作者為「佚名」，自述以坊間流行之《唐人小說》本為底本；雖該本云已據《顧氏文房小說》校錄，先生以為實猶脫誤時有，並引用《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鈔補之《唐語林》，謂其卷五「補遺」，即全錄此一故事；雖未明其所據何書，然與《太平廣記》所載者多同，其中一二字句且可從以校正。²³由此可見，先生對於版本校勘考究非常，因為這樣「廣為檢對異本」，才可能進一步「校訂字句之疑譌」。

此外，又如一向不受重視的〈浮梁張令〉，若據《太平廣記》卷350所載篇末注：「出《纂異記》。」則應為晚唐作品。但《禪海》本《搜神記》卷六亦載此文，僅篇首〈浮梁張令〉更易為〈德化張令〉，其餘大致無異，若據此，則又該為晉人的作品。對此問題，王先生首從版本詳加考證，指出：《太平廣記》為宋本，《禪海》之《搜神記》為明人從唐宋類書重編，其價值遠不及《太平廣記》。其次，先生復就縣名來歷、京師方位、神祇封號、文中道士提及之「隋朝」，以及文字風格等方面細察求證，遂斷定〈浮梁張令〉確非干寶《搜神記》的舊文，應為唐人小說。²⁴

以上略舉數例，為的是說明先生這些重要的基礎校勘，吸納了前人如魯迅、汪辟疆等人的研究精華，成為開創性的校補。除此以外，先生更進而對唐人小說的編集、作者生平、故事源流、主旨及藝術美學，有

²² 《唐人小說校釋（上）》，頁 332-333。

²³ 同前註，頁 333。

²⁴ 同前註，頁 246-250。

既廣且深的探析。可以說，先生的每一篇論述，總是能從前人著作中去發現「不疑處有疑」，中間復經由詳密的考辨字句、注釋文旨，最終得出具有新意的見解。

三、考辨、注釋的嚴謹功夫

王先生嘗以治經經驗研索《文心雕龍》、《唐人小說》，從中皆能見其學識淵博、考證精當、衍釋嚴謹的功力。約自1968年起，先生推出系列散論《文心雕龍》之作，1981年完成《古典文學的奧秘——文心雕龍》。其對經學乃至於文心文論的深刻探討，顯然都相當有助於小說的詮解。

自魯迅援引胡應麟云唐人「作意好奇」的小說創作自覺，與「施之藻繪，擴其波瀾」之「文采與意想」的營構技巧後，²⁵頗影響及近人選讀唐人小說的關注點。王先生同樣認為「巧於敘事」本為小說的旨趣所在，其精巧者之敷敘，往往能搖蕩讀者的性靈；「不僅形見於摛詞造語之工，必也有所豫聞事態之大體」。然則巧拙的分判，必然關乎讀者對往事前聞的素習。唐人敘述唐事，後人因為年代懸遠，不只是痛癢相關之情淺，甚至時俗行為也多所隔闕；往往有待方家註解而後可以通曉。因此先生自稱其注釋唐人小說的用意，即在於「欲變生疏為熟習」，因惟能熟習，然後可以解意通情；情識相通，然後知其摛詞造語乃至敘事之巧拙也。²⁶

解讀文學本來就需要通情解意，亦即尋求讀者與作者、文本意識情感的相通共鳴。王先生說，距今千餘年的唐人小說，於字裡行間所吐露的當時心聲，多關係一代的典章文物，世故人情；然而此等文物人情，

²⁵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章「唐之傳奇文（上）」，收於《魯迅小說史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92），頁59-60。

²⁶ 《唐人小說校釋（上）》，「前言」頁2。

迭經世變之餘，不免名實兩乖。此所以需要校勘舊文，辨明章句，詳加注釋，一者可以考見原文的真面目，以期無負作者的苦心；再者也為了裨益同好的閱讀研析。除了廣為檢對異本以校訂字句的疑譌外，先生對於有關唐人習用字語或與後世不盡相同者，以及藻飾辭面而縮造典語故實者，也都再次引據原書來為之解釋。²⁷

姑舉〈霍小玉傳〉中先生的注釋為例，以明一斑。如注四云：

天官。《周禮》六官以冢宰為天官，後世弗用。《舊唐書》〈職官志〉云：光宅元年九月改吏部為天官。神龍元年二月又復舊名。《新唐書》〈選舉志〉下云：「凡選，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此云『俟試於天官』，即候吏部拔萃之選，似是建中時事。²⁸

詳察此注，可以窺知先生列舉《禮記》、《新唐書》、《舊唐書》的知識，結合小說時代語境，社會習尚，為的是增拓讀者對文中主要人物李生與霍小玉情事的理解。亦即系出名門、才思無雙，已經進士擢第的李生，是因為等候吏部拔萃之選而到長安，他與小玉相逢的機緣，乃是存心趁著人生此一空檔「博求名妓」，以作冶遊之計；沒想到初出風塵的小玉，卻以假為真，性命相許，終遭情郎遺棄，因而敷演出一場生死大悲戀。

茲再舉注十三「追風挾策」條。先生文云：

追風，舊有二解：崔豹《古今注》下「秦始皇有名馬曰追風」；《文選》四六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絕景追風之騎」，張詵注曰：「絕景追風，良馬也。」又，《文選》三四曹子建〈七啟〉，李善注曰：「絕野追風，言疾也。」良馬、迅疾，意可通貫，然用之於此，殊不相合。《文心雕龍》〈辨騷〉「是以枚馬追風而入麗」，則以追風為追跡前人之風流。因疑此處語涉雙關，

²⁷ 《唐人小說校釋（上）》，「前言」頁3。

²⁸ 同前註，頁201。

以追逐風流為「追風」，因而「挾策」亦非執鞭或攜書之意，而為尋花問柳廣具謀略，猶世所謂「馬泊六」者也。²⁹

這條注涉及相當豐富的知識材料，為了讓讀者更貼切認識〈霍小玉〉中為李生穿針引線的鮑十一娘，其出身來歷與言語行徑，先生所引用的書目旁及《古今注》、《昭明文選》、《文心雕龍》等詩文、文論，以及民間俗語，為的是如前面說過的，變生疏為熟習，因為惟能熟習文本字句，然後讀者與作者、作品之間，才可以解意通情；情識相通了，庶幾得以慧悟其摘詞造語乃至敘事抒情的巧拙高下。

且引文中事例說明，霍小玉初見李生時，「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不少讀者乍讀之下，會以為作者寫錯或傳鈔有誤，「見面不如聞名」應該是俗話說的「聞名不如見面」才是。可是詳觀王先生的注三十八云：

此以「細語」出之，文意婉曲。見面不如聞名，是反常之語。……

即以反語示其絕望……。故下文即接以「生連起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色，兩好相映，才貌相兼」云云，自示有才無貌。³⁰

從這條注不僅體會先生細心的解讀，更呼應了文中李生要去初會小玉時「澣衣沐浴，修飾容儀，……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不諧。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那一段描寫。讀者因此更知解、感受到，由於李生對自己的容貌毫無自信、忐忑不安，是以必須裝扮甚久，冀求佳人青睞。難怪尚無歡場歷鍊的小玉一見到他，不假思索輕聲說出「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的失望話來。而先生注文中說的「以反語示其絕望」，顯然暗伏霍小玉日後在情愛路上的坎坷困頓，乃至於真正絕望。故小說文字其實是有內在的貫連性的，絕非作者誤書。

〈霍小玉傳〉文末敘及小玉亡後，果如其遺言，作崇李生的妻妾，讓李生覺察其妻盧氏與外人有私。文中提到「相思子、叩頭蟲、發殺菁、驢駒媚」數物，由某一年輕男子將之置於一斑犀鈿花盒子內，外裹以輕

²⁹ 《唐人小說校釋（上）》，頁 202。

³⁰ 同前註，頁 206。

絹同心結，投贈盧氏。在盧氏房中發現這些東西的李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其妻。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等到盧氏被逐出家門之後，與李生暫同枕席的侍婢媵妾，無一不飽受妬忌猜疑，居然「或有因而殺之者」。後來李生再娶營十一娘，每次出門前都拿「浴斛覆營於床，週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小說作者寫他為了肅清閨門，日日蓄劍，恐赫家人，「乃至於三娶，率皆如初」。³¹

觀諸文意，若非先生詳注「相思子、叩頭蟲、發殺觜、驢駒媚」，讀者恐無法深入領略其意象運用的精妙。且看注九十三云：

相思子，紅豆也。其數二者，謂彼此互相思也。叩頭蟲，小甲蟲也，按之即磕頭有聲（《全晉文》卷51有傅咸〈叩頭蟲賦〉）。其數一者，謂一方叩求也。發殺觜，猶古人所佩之觿，觿為解結之物。其數一者，謂有待一人為解鬱結也。驢駒媚，媚藥也。《格致鏡原》卷83〈驢類引物類相感志〉云：「驢駒初生未墮地，口中有物如肉，名驢駒媚。婦人帶之有媚。」其數少許者，謙不求多也。凡此數事，蓋皆以物示意：謂相思既深，叩求解結，少賜媚寵；亦即意在「求歡」也。³²

注文細致剖析，體察入微，無怪乎李生如此反應，原來是完全符合藝術公理與想像邏輯。「相思子、叩頭蟲、發殺觜、驢駒媚」的名物訓話，文獻考據，實貫穿全文意的詮解，讓讀者有驚心的意象迴盪感。

至於小說極寫李生妒疾之甚，其實不無所本。王先生於「敘錄」中廣引新舊兩《唐書》〈李益傳〉、《柳宗元文集》卷十二〈先君石表陰先友記〉、《李文公（翱）集》卷十〈論故度支李尚書〉、李肇《國史補》、舊《唐書》〈職官志二〉、明胡應麟《莊嶽委談》、《全唐文》、《全唐詩》等相關資料，詳密考證李益、蔣防其人其事。推論李益猜忌的心疾，早就盛傳於貞元以來的朝廷公卿之間，本傳云其「為秘書少監

³¹ 《唐人小說校釋（上）》，頁199-200。

³² 同前註，頁213-214。

集賢學士，自負才地，多所凌忽，為眾不容」。雖然後人無法確定蔣防是否曾經遭受李益的凌忽，然而應屬「眾所不容」的眾中之一人。故先生認為，「其作〈霍小玉傳〉不特繪影繪聲，有如親見；抑且深文周納，強無破綻。」這個故事留傳於當時，「雖不足為諫官之口實，而後之史官則頗採以入錄」。觀諸兩《唐書》〈李益傳〉全文都不過數百字，可是獨於此事從未漏略，亦可見小說「傳誦弗衰」的實效了。³³

很多時候先生的注釋，詁經考史，旁及輿地，貫通社會制度，或溯源故事源流與作者成篇因緣。這樣認真的做法，為的是有助於對作品的理解。他的《唐人小說校釋》上冊頁一即附有元和年間的「藩鎮圖」、頁二有「長安城圖」、頁三有「洛陽城圖」、頁四有「唐大明宮圖 東內苑附」、頁五有「唐禁苑圖 內苑附」、頁六至頁八分別為「唐驪山宮圖上」「唐驪山宮圖中」「唐驪山宮圖下」。層次歷歷，方位井然，從圖文互證中，即可概觀先生治學的謹慎用心。茲略舉數例述明。

如〈李娃傳〉敘述天寶中常州刺史滎陽公的愛子鄭生，甫弱冠之年，到京師等待考期，起初居於布政里，嘗游行東市，自平康里東門入，至鳴珂曲，從此沉溺長安倡女李娃的故事。有關文中提及的一些地名，讀者很容易就可以在前述的「長安城圖」中找到東市、平康里……的位置。王先生的注十一，「毗陵」條，下云：

常州之舊名，布政里在長安朱雀街西第三街，東向皇城，西南為西市。又，注十二內文謂，東市在朱雀街東第四街，占有兩坊之地。徐松《兩京城坊考》卷三云：「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集積。」³⁴

類此參照圖表作注，讀來具體明晰，容易增益想像，有若親眼目睹一般。接下來的注十三，更是充滿世態人情的觀察。姑引部分內容如下：

平康里在朱雀街東第三街，東門向東市，北為崇仁里，南為宣陽里。孫榮《北里志》云：「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

³³ 《唐人小說校釋（上）》，頁 215-218。

³⁴ 同前註，頁 176。

之聚也。妓中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此文云「自平康里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則鳴珂曲即南曲歟？《劇談錄》（並見《太平廣記》三四八引）言勝業坊富人王氏，過鳴珂曲，遇安品子，數年而家資蕩盡。然則唐人固以鳴珂曲為銷金窩也。³⁵

先生詳注平康里、鳴珂曲的地景風情，處處學問，復不失人情，宛然有趣。讀者當因此會心，知曉鄭生一旦進入此地巧逢名妓李娃，其實不過是歡場舊戲的重新演出，可是由於小說作者的敘事纖巧、抒情綿密，遂能成為經典名篇。

而先生於注釋中所賅備的學識，常及於當時的社會禮制，以及流傳久遠的民間習俗。如鄭生初遇李娃那天，就不想歸去。文中云「日暮，鼓聲四動。」先生於注二七詳引《舊唐書》〈職官志二〉「城門郎」、《新唐書》卷四九上、《藝文類聚》前集卷六、《太平廣記》三五四「劉行敏」條等資料，說明此處的「鼓聲四動」，正是諸街鼓承振之時，即將禁止往來也。³⁶不只剛好可以符應文中姥（娃母）催促鄭生「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的說詞，也能讓讀者迂迴體察，滎陽公子於李娃一見鍾情之切、引君入彀之深。

再如文中李娃欺騙鄭生去向「竹林神」求子嗣一節，先生注三二云：竹林神者，韓愈《文集》卷二三有「祭〈竹林神文〉」。其文撰於長慶三年（823），時逢秋旱，韓愈為京兆尹求雨於竹林神，可見時人崇拜此神，歷久不衰。《水經注》卷三六「溫水」，言及竹林神；其說出於《華陽國志》，然而何由降於長安？《太平御覽》卷九六二引《地志》云：「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陸海。」則似竹林為一地名。而李娃謁其祠宇信宿乃得返，

³⁵ 《唐人小說校釋（上）》，頁176。

³⁶ 同前註，頁178。

當在長安郊外歟？《長安志》卷十八云司竹鄉在盩厔縣東南二十里，而盩厔縣城則在長安西北；竹林神或即在其中途也。³⁷

此條看似尋常的注語，卻是先生審讀韓愈《文集》，兼及《水經注》、《華陽國志》、《太平御覽》、《地志》、《長安志》等輿地類書，融貫小說人物言行，並涉及當時民間習俗，才推論而成的。當然，有了這條注文，讀者尤能解識老鴉與李娃的金蟬脫殼之計，是多麼現實無情。

又如，滎陽公子床頭金盡被倡家斥逐後，淪落到「凶肆」（類今之葬儀社）唱輓歌維生，文中說到「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先生注四三詳為考索，內文如下：

《禮記·曲禮》下「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疏云：「凶器者，棺材及棺中服器也。」按《唐會要》所載此項凶器，包括有明器，四神十二時，輻車，油幘、披、鐸、翼、挽歌人、方相車等，其數目因其人之品位高下有差。³⁸

真是注解得文字詳駭，知識細備。像這樣援引《禮記》來注解唐時社會禮法制度的例子頗多，不但能使讀者知悉華漢文化本質的累世相承，也能因此更接近文本的情境，產生即臨感，從而了知作者摛詞造語的用心、敘事抒情的精巧。

至於有些小說的故事來源，成篇因緣，先生亦列舉其重要者，深入研析，希望求得原本真相。以李娃故事而言，先生〈讀《李娃傳》偶記〉嘗指出，白行簡寫的這篇傳記，不僅在唐世曾經以〈義妓傳〉的名稱行銷東洋，影響所及造成《李娃物語》、《小林鐵之丞久夢日記》一系列的日本故事書。同時在國內也歷久不衰，像宋人話本、元代雜劇、明世傳奇，以迄近代從舞台搬上銀幕，而作品也由原先簡潔的古文轉寫成細膩的語體長篇，不論在學術研究領域，或一般讀者觀眾接受的層面，都有其一席之地。不過，自晚唐以下，對《李娃傳》的評價即有差異。如李匡乂《資暇錄》稱其為「節行娼」故事，陶穀《清異錄》的引稱，則

³⁷ 《唐人小說校釋（上）》，頁179。

³⁸ 同前註，頁180。

說它是「敗家子的龜鑑」。總之，李娃故事中的滎陽公子因為過份沉溺煙花，拋擲了錦繡前程，與父親的期望，始落得悲慘的下場。但這個下場，卻正是節行娼故事的重要開始，而作者也從此扭轉敘述的情節，愈出愈奇。最後竟然九轉丹成，功德圓滿，以喜劇收場。³⁹

就此而論，王先生以為在當時的現實社會裏，如此的結局是不可能的，恐怕是作者「意存反諷」，暗含玄機。若細加考究李娃故事的來源，應該就可以得到答案。先生採信張政烺〈一枝花話〉的論證，同意〈李娃傳〉是依據說書人的〈一枝花話〉寫來的。曾慥《類說》、羅燁《醉翁談錄》都存此說。因此〈李娃傳〉的結局，雖看似違反當時士族不能娶倡伎為妻的法度，卻能滿足市井小民的虛榮心。在前人考證李娃故事是出於「說話人」的基礎上，王先生更進一步，從文中材料的運用，與運用這些材料的心態，列舉許多佐驗，例如孫綦《北里志》，《太平廣記》二六〇引《獨異志》等，來強化〈李娃傳〉確實是出於說話人相傳的舊本的說法。⁴⁰

³⁹ 詳參王夢鷗，《傳統文學論衡》，頁 241-242。

⁴⁰ 詳參《傳統文學論衡》，頁 243-245。文中引據《唐會要》卷八十三載有唐開元二十二年二月的一件敕書云：「諸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違者，雖會赦，仍離之。其州上佐以及縣令，于所統屬官同。其定婚在前，居官在後；及三輔內官，門閥相當，情願者不在禁限。」先生以為〈李娃傳〉托言天寶時事，距離這明文的規定不過十來年，既不聞有新法律改變舊法律，則這規定當然適用於〈李娃傳〉的結局；然則鄭李兩家決不可能結為「秦晉之好」，何況二者之門不當、戶不對，如何會有這怪事出現？可是自古以來卻沒有一個讀者提出這樣的刁難，似乎都只把它當成「小說」看待，不能亦不必論其事實的有無。即便如此，王先生覺得想像也不能離開常識的判斷太遠。而白行簡雖出身寒門，從其朋友一輩及近至於他兄嫂的婚姻情形看來，他還未必有這樣革命性的主張，在小說末了讓「現任的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與鳴珂曲的老鴛成為面對面平起平坐的親家。」因為在當時現實的社會裏，還有極頑固的門第觀念，要白行簡劇平貴賤的階層來為男女主角打圓場，實在不太可能。如果注意到「一枝花」的故事是〈李娃傳〉的藍本，就能了解說話人講這個故事是符合市井小民的心態的。也就是說，市井小民既不懂當時官場上有什麼敕令，僅是對那囂張的門第觀念與特殊身份看不順眼，他們只認為花花公子有錢買笑，沒錢了就該打瓦罐，睡糞窟，這是他們的公道；如果一枝花為著同情竟「倒貼」來補償花花公子的損失，那些官員就理該給她來個明媒正娶，這才合乎他們所認為的公道。因此〈李娃傳〉的結局雖似違反了當時的法

此外，篇末的「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先生也詳加考辨，指出「乙亥」應為「己丑」形近之誤。蓋行簡一生僅逢一次乙亥歲，時為唐德宗貞元十一年（795）。根據《白居易年譜》，是年白居易二十四歲，行簡二十歲，前一年五月喪父，兩兄弟就地服喪，迄未終制，當然不太可能與李公佐話及〈一枝花〉的故事，而且也尚未到過長安。己丑為元和四年（809），是年白行簡為校書郎，與兄同住在長安新昌里，和元稹共聽〈一枝花〉話。元氏既有〈李娃行〉長歌之作，白行簡復因李公佐的慫恿，乃為之作傳。簡要說來，此一本於當時市人小說的李娃故事，王先生認為「蓋以取悅市井小民，使聞之而快心也」；故元白寒士，遂亦樂聞。至此整個成篇因緣的推論過程，完全入乎情理，同時也解決了宋人所作種種影射的說法。⁴¹

度，但卻能滿足市井小民的虛榮心。尤其是，先生認為整個故事所穿插的材料，除了花街柳巷的場面之外，其描寫凶肆小人物的活動尤為突出。文中引孫綦《北里志》言：「嘗聞大中（847）以前，北里頗為不測之地，故王金吾氏、令狐博士瀉，皆目擊其事，幾罹毒手。」其所謂毒手，當不外謀財害命之事；〈李娃傳〉寫到綦陽公子床頭金盡，老鴿串通李娃，使個金蟬脫殼之計拋棄了他。這種毒計，由說話人說來只覺得是順理成章，而且事件進行之際還使用幾個「笑」字了之，不似《北里志》的撰者選用「不測」「毒手」等等大驚小怪的字眼。這種差異，倘有可言，那將因二者之身份不同，據說孫綦是「翰林學士」，而說話人只屬於「倡優儕類」的市井小民。又，文中對於凶肆裏的一夥人，說話人誇示其江湖義氣，更是對比諷刺當時士大夫的門第觀念。《太平廣記》卷 260 引《獨異志》，說京兆少尹李佐的父親，遭逢安史之亂流落在凶肆中過活，到了兒子貴為京城長官，終於尋回老父，迎至官中奉養，但老父念念不忘凶肆同儕的情誼，最後還是溜回凶肆打歌度日。王先生根據這些資料推論，當時長安的這類丐幫，應該是說話人耳熟能詳的事實，故說來絲絲入扣；不似文人墨客，只看他們生活的一點皮毛。是以從〈李娃傳〉材料的運用，與運用這材料的心態上，亦可見文章是出於說話人相傳的舊本。由以上引錄可見，王先生整個論述過程非常精彩。

⁴¹ 詳參《唐人小說校釋（上）》，頁 187-191。

四、縮合人情事理的審美論述

因為深諳「文學為語言的藝術」，所以先生的研究論述，不只注重嚴謹的治學態度，還會顧及它的藝術性。不論鑽研先秦兩漢六朝或唐代，先生對典籍資料都極熟稔，並由熟稔而及於得當的運用。如收在《傳統文學論衡》中的〈敦煌殘卷《周秦行紀》集校之商榷〉一文，除廣蒐資料以為校訂之外，更參酌人性觀察、世情流變加以疏理，遂能有不刊之論。⁴²餘如同書所收的〈《柳毅》傳書故事之考察〉，先生上溯先秦兩漢六朝隋唐文獻，佐以佛典故實、民間傳說、宗教義理，下貫《聊齋》〈織成〉，細膩爬梳，審慎推理，堪稱文情並茂，除使讀者知曉此一故事繁複的文化淵源外，復能精密體會其中的審美情操，與文章旨趣。⁴³

而之前舉先生治唐人小說的例子，即可看出先生對唐代各項人文、地理、經濟、官制的豐富涉獵，這些學識使他的學術見解能夠兼具微觀與宏觀，在精實的推證過程中，飽含人情世理，其附在每篇小說後面的「敘錄」，往往發人省思、低迴再三。如陳寅恪以外緣資料考證〈鶯鶯傳〉中鶯鶯的身分應是妓女，王先生於「敘錄」中進一步強調元稹此作雖情節古已有之，惟摹寫鶯鶯「愁豔幽邃」的情態，則前無古人，所賦予鶯鶯「千秋絕豔」的性格，更「使其人呼之欲出，於唐稗中無與倫比也。」先生廣採異本以為校釋之後，發現〈鶯鶯傳〉中言張生西行，崔氏臨別援琴撫「霓裳羽衣序」，諸本皆同，只有舊鈔本《類說》卷二六據《異聞集》作「廣陵散」。先生以為「廣陵散」琴曲，乃嵇康臨刑鼓之，於此用意相關，而霓裳羽衣則無意義矣。⁴⁴此一考辨初看似似乎無關正文宏旨，其實頗具審美深意，正合乎愛情幽微與人性曲詭的考量，因

⁴² 詳參《傳統文學論衡》，頁 253-259。

⁴³ 詳參《傳統文學論衡》，頁 260-270。

⁴⁴ 《唐人小說校釋（上）》，頁 101-102。

為張生將與鶯鶯分手斷情，鶯鶯以「廣陵散」送他，暗喻與張從此兩隔，心碎如亡。

他如有關文中「普救寺」的考索，先生援引清乾隆重修《蒲州府志》卷三、今《山西通志》卷一七〇所云，稽之道宣《續高僧傳》卷三九「普救寺《道積傳》」等資料，推論可能因為「西廂豔事有玷淨域」，所以《蒲州府志》乃附詞說明，普救寺原名永清院的緣由。⁴⁵凡此論點，都不僅僅關乎文獻的熟諳，重要的還在於對世態人性的理解，方能得當地判讀、運用典籍。

〈鶯鶯傳〉就作者部分而言，陳寅恪曾結合元稹其人其作考證，有所謂「巧婚巧宦」之說。⁴⁶先生復據《舊唐書》一六六《新唐書》一七四〈元稹傳〉，擇其要者敘錄。有謂：

元稹（779-831）……元和元年舉制科，歷左拾遺，監察御史。勇於摘奸發覆。間於驛次與太監爭廳，受傷，反受貶謫，遂一變其操履。干諛近倖，卒躋將相之位。然素行無檢，不為公議所許。生平與白居易交厚，世稱元白，詩文號元和體，亦毀譽參半。……其遺著《元氏長慶集》，傳至宋代即有殘落，遂亦不見其有此作也。⁴⁷

其間輾轉論說〈鶯鶯傳〉的義旨，實有當時〈長恨歌〉、〈長恨歌傳〉「懲尤物，窒亂階」文壇風氣的影響；當然也與元稹出於「感舊追懷」的懺情心理相關。⁴⁸可見先生論述〈鶯鶯傳〉，一再出入文史，游刃世情，精彩的見解化入高度的審美情操，也讓讀者俯仰其中、盪滌提昇。

再如沈既濟〈枕中記〉，向來論者皆知其故事源自劉義慶《幽明錄》，後收錄於《太平廣記》卷283的〈楊林〉；然而往往未能詳及考索沈氏成篇內外因緣。先生早於1960年即提出〈《枕中記》及其作者〉與中唐楊炎集團的宦途升降有關。〈枕中記〉篇後「敘錄」云：

⁴⁵ 同前註，頁 102-103。

⁴⁶ 〈元白詩箋證稿〉，《陳寅恪先生全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99。

⁴⁷ 《唐人小說校釋（上）》，頁 103。

⁴⁸ 同前註，頁 100。

沈既濟大歷中奉職京師，因其經學賅明，尤工史筆，為吏部侍郎楊炎所賞識。大歷末……楊炎為相，引既濟入中書省右拾遺兼史館修撰。不及二年，楊炎得罪，賜死南荒，既濟亦受株連，貶為處州司戶參軍，去京師四千二百七十八里。兩年後，京師大亂，德宗西走奉天，力圖恢復。攘擾經年，始告平定。改元貞元（785），大赦天下，既濟或因此得以還京，位終於禮部員外郎。……沈氏以其史才而任史官，為一適意之事，前後不及兩年，可謂短暫之至。再以楊炎宦途發跡之事觀之，其飛黃騰達，至建中元年臻於極點，而殺身之禍亦隨與俱來。即使沈既濟不自覺人生適意之事難求而易逝，然以其久居京華而熟知當代史料，則其看人富貴，亦當深感其如夢幻泡影；何況生平知己如楊炎者，其影事歷歷悉在眉睫之前乎？⁴⁹

因此先生以為〈枕中記〉中的盧生，實似為楊炎寫照；至於追求「人生之適」以至於幻滅，則是作者親聞目擊而得的心證。⁵⁰

細察敘錄全文，當可知先生審讀新舊《唐書》沈既濟與楊炎的傳，從實有證據入手，結合沈氏仕宦禍福，層層推進，感懷世道艱難，天威難測，人世如幻，從而結論出〈枕中記〉乃：

以「楊林」故事為間架，作者自寫其見聞與感想，則為淺顯易見之事實。惟其中以「蒸黍」一事表示夢境之短暫，是其意匠經營之筆，遠非志怪者所能及；又不僅其歷敘宦途升降，出將入相，有關朝章國典與當代史事，莫不暗合而已，此所以李肇稱之為「良史才」乎！⁵¹

先生如此結合史實與人情事理，來逐步探析小說的主題意旨，其論述新穎通情。最後說明自本篇行世以來，即受時人重視，文士運筆寫「烏有」「亡是」之事，亦寢假成為風氣，於是由纂異而傳奇，使唐人於歌詩之外，別放異彩，是其可尚者也；又不特邯鄲店，盧生枕，黃粱夢，為後

⁴⁹ 《唐人小說校釋（上）》，頁 35-36。

⁵⁰ 同前註，頁 36。

⁵¹ 同前註，頁 37。

代詩人常用之典實，更演為北曲南詞之祖述不厭而已。⁵²這樣積累的論據令人信服。

至於「敘錄」中所旁及的問題，如宋洪邁《容齋四筆》卷一指出〈枕中記〉故事源於《列子》〈周穆王篇〉；又如霍世休認為盧生之夢出自《雜寶藏經》卷二「娑羅那比丘現夢」等見解；王先生除據《偽書通考》「列子考」為之辨明外，復以佛經之夢意在「懲忿」，盧生之夢則意在「窒欲」，實迥不相侔。「況其入夢之由，端賴呂翁之瓷枕，為它書所未及者乎？」⁵³這樣相互流通的微觀與宏觀，顯然涉及美學哲理的深刻層次，確實別具慧識。豈不恰好同時印證先生於《校釋》「前言」所云的「幸無違失懷古之幽思」乎？⁵⁴



圖3 林明德先生與王夢鷗先生合影（出自林明德，《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

五、結語：日新又新，謙和博雅的人格與風格

王先生治學的學域極寬，以上略舉一些例子（主要是唐人小說），希望能藉以管窺其研究進徑與學術心得。全文雖然分成校勘、注釋與論述三個部分來談，其實可以發現其間縱有先後、主從之別，最終還是相輔為用。先生一直認為，做學問離不開博學審問慎思，之外還要透過自己的經驗，把各方面的東西連貫起來看清楚，用知識結合生活體驗，堆積起來去印證典籍資料。像是如果能通過人情練達來詮釋文學，更能發

⁵² 同前註，頁 37。

⁵³ 《唐人小說校釋（上）》，頁 37。

⁵⁴ 同前註，頁 3。

現人性，而人性乃是一切文學史學哲學美學宗教的根基。⁵⁵先生的文章讀起來，總是知感兼備，其中不但飽含文史學問，還處處暗藏生活情感。每每在前人卡住的地方，或早已成定論的所在，先生都能運用體己的反省功夫，去開掘人世的問題；使他的學術研究長保活潑的生命力。⁵⁶先生一生浸淫古今中外經典，精研文學、美學理論和創作，落實為「日新又新，謙和博雅」的人格特質，實允為二十世紀一代學者的人文典範。

⁵⁵ 《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頁 24。

⁵⁶ 黃奕珍、丁肇琴，〈王夢鷗先生的唐詩及唐人小說研究〉，頁 19 云先生「永保日新又新的詮釋活力」。

Collation, Annotation, and Discourse
——Broadness and Profundity
of Scholarship of Wang Meng-Ou

Fang-Ling Lai*

Abstract

Wang Meng-Ou had work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ies since his childhood. Later i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literature at Waseda University, Japan, he started his research on world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by way of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studies and modern knowledge. Possessing the western horizons of the humanities, Wang combine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rites, the social system, and folk customs so as to form reference for literary and poetic theories from different dynasties. His rich and profound scholarship was notably shown in all sorts of research such as Chinese classic novels, the theory of rites, modern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Based on collation, annotation, and discourse, this essay aims to examine his scholarship, methodology, and understanding with a restricted view and wishes to remind today's students of the predecessor's sound and honest style of study and to learn from the human model he established.

Keywords: Wang Meng-Ou, scholarship, human model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